

十九世紀末俄國莫斯科大學 史學派之簡介

—— 何 萍 ——

壹、前言

貳、俄國傳統史學的末代宗師——卡拉姆金

參、莫斯科史學派的一代宗師——柯留契夫斯基

肆、莫斯科學派的末代傳人——普拿托諾夫

伍、結論

壹、前言

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是俄國史學史中最璀璨的一頁。俄國史學經過前二、三百年的發展，到此階段開花結果，並有創新的發現與新領域的出現。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中，俄國史派、史家人才輩出，史著，乃至與史學相關的博物館、研究機構、學會也紛紛問世。(註1)這階段的史學

註1 例如1804年，莫斯科大學成立第一個史學研究機構——「莫斯科歷史暨俄國古物學會」(Moscow Society of History and Russian Antiquities)，致力於史料與古物之蒐集；參見 Anatole G. Mazour,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rept. ed. (Westpoin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5), p.69。當時著名的史學刊物則有《俄國檔案》(Russkii arkhiv, 1863-1917; Russian Archive)。俄國最早的歷史博物館係於年建於莫斯科紅場；參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trans. from 3rd. ed. of Bo'lshv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1973), pp. 74, 80。

流派大致可分為保守、中庸、自由與革命四大類型。保守派傳承前輩的主張，支持專制政體、理想化農奴制度、強調宗教與道德力量，並宣言此即是俄國歷史發展的三大柱石。保守陣營中亦有崇古與民族主義傾向的斯拉夫本土派(Slavophilism)。該派嚴厲譴責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運動，謂其斬斷了斯拉夫族原有的優良傳統，致使斯拉夫族日益淪喪。(註2)此外，與保守派相關，且維持十八世紀史學傳統的史料派，則強調客觀求真，史料自會說話、展現真相，無須史家添加意見。此派以聖彼得堡大學為重鎮，故又稱之為「聖彼得堡大學派」(Th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註3)中庸派則介於新舊之間，諸如法制派(Juridical School)即屬此類。此派主張史家不應盡信史料，對史料應採批判的態度，故又稱為疑古派(Skeptical School)。該派史家雖同意國家為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但也強調歷史乃是法制與社會不斷轉型的過程，因此庶民在歷史流程中，也應扮演次要的角色，不容全盤忽視。此派因側重國家與法制的因素，故又有國家派(State School)之名。(註4)

註2 斯拉夫本土派實為崇古派，認為俄史發展的三大柱石為：東正教、君主專制與農奴制。本土派也強調政府與人民關係的和諧性；參見 Mazour, pp. 100-103; Encyclopedia, p. 434。

註3 聖彼得堡大學派強調史家的客觀與公正性，認為史家的任務僅在提供事實。該派學者並主張：史著的最高藝術在求真，不應提供任何足以影響讀者的訊息。此派深受德國史學影響，尤其是蘭克學派。事實上，此派即由俄政府所聘的日耳曼史家所開創；參見 Encyclopedia, p. 90, 433; Mazour, pp. 40-51; John T. Alexander, "Introduction," in Sergei F. Platonov, The Time of Troubles, trans. by John T. Alexander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0), p. xi。

註4 Encyclopedia, p. 437; Mazour, pp. 119-127。法制派尚主張：(1)政府與國家為歷史發展的主導因素；(2)歷史進展乃各民族、各階段集體努力累積的成果；(3)歷史有一基本法則存在，即由鬆散的小部落經有機性的成長，轉變而成現代之國家；(4)若抗拒此一法則，將造成社會之不安，此亦為歷史上不安定現象的主因。

被蘇聯史家稱為「資產階級史學」(Bourgeoisie Historiography)的自由史學派(註5)，無論在史論、史學方法上均有所創新。此派強調對史料的分析與解釋，主張應將俄國史置於世界歷史發展的網絡中重行檢視之，更重視歷史發展中的社會經濟因素與動力。自由派陣營中包括了西化派(Westernism)、莫斯科大學派(Th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oscow)等。此外，尚有各種革命史學派，例如革命民主派(Revolutionary-democratic School)、馬克斯史學派(Marxist School)等，彼輩多屬政客史家，專業性不高。(註6)

在上述諸家史學流派中，莫斯科大學派尤其值得注意。該派為俄國史學中首倡經濟社會解釋觀的史派，並提出社會階級分類與其在歷史中的角色問題。此派對後起之秀的馬克斯史學頗具前導功效——蘇聯早期的史家多曾習業於莫斯科大學史語系。

十九世紀中，俄國史學界更是大師輩出。計有早期保守的卡拉姆金(Nikolai Mikhailovich Karamzin, 1766-1826)；介於新舊間，且為莫斯科派大師的索羅維也夫(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 1820-1879)；法制派的齊曲林(Boris Nikolaievich Chicherin, 1828-1904)；聖彼得堡大學派的宗師留敏(Konstantin Nikolaievich Bestyzhnev-Ryumin, 1829-1897)；發皇莫斯科大學派的柯留契夫斯基(Vasilii Osipovich Kliuchevskii, 1841-1911)；以及集聖彼得堡大學派與莫斯科大學派於一身的普拿托諾夫(Sergei Feodorovich Platonov, 1860-1933)，和西化派的米留柯夫(Pavel Nikolaievich Miliukov, 1859-1943)等等。

在上述諸宗師中，最具承先啟後功效的應首推莫斯科大學派的柯留契夫斯基。他也是十九世紀俄國史學界中最偉大的史家。在俄國史家中

註5 Encyclopedia, p. 438。

註6 蘇聯百科全書甚至將列寧等政治人物亦列入革命史學派，並按政黨主張而分為「革命民主派」、「社會革命主義派」……等；參見 Encyclopedia, pp. 438-39

，柯氏首先提出社會階級衝突概念，並以社會經濟學角度詮釋俄國歷史之發展流程。他強調史學研究應借用其他學科如心裡學、考古學、語言學、地理學、經濟學等的研究成果與方法。然而，柯氏並不貶低史料的重要性。相反的，他引用大量的檔案、傳記、文學詩歌等史料，且予以比對、批判、旁敲側証等方法，再賦予邏輯性的解釋，使各歷史事件相互牽引，躍然重現於世。柯留契夫斯基的史學地位尚不止於此。由於他善於表達、整理、歸納，他的門生可說是桃李滿天下，許多二十世紀俄國史學界的新秀，乃至早期蘇聯的史家均出於其門。更有甚者，早期蘇聯史家雖號稱以馬克斯理論解釋俄國歷史，但實際上仍逃不出柯氏社會經濟解釋的架構，特別是社會階級衝突方面。因為奠定蘇聯史學基礎的大師波克羅夫斯基(Mikhail Nikolaievich Pokrovskii, 1868-1932)，即是柯留契夫斯基的學生。(註7)

柯留契夫斯基的史學著作不算少，但為西方史學界所知者則不多。這不僅源於語言隔閡，也因為蘇聯奪得政權後，即將俄國關入鐵幕中，因此柯氏著作流傳到西方世界的並不多。柯氏著作中，最著名的則是其死後，門生將他生前上課之講義整理付印，名之為《俄國歷史》(A Course in Russian History)，共五冊，其中尤以第三冊——《十七世紀史》——最具代表性，也唯有此冊有英文翻譯本問世。(註8)1987年，蘇聯史學界再將柯留契夫斯基的著作彙集出書，共九冊。書甫問世，即成為西方史家爭先搜藏的對象。(註9)

本文擬以柯留契夫斯基為中心，由上推至卡拉姆金，下延至普拿托

註7 Mazour, pp. 186-194; Encyclopedia, pp. 265-66。

註8 Encyclopedia, pp. 543-44; Mazour, pp. 129-39; Alfred J. Rieber, "Introduction," in V. O. Kliuchevsky, A Course in Russian History, trans. by Natalie Duddingt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p. viii。

註9 V. O. Kliuchevskii, Kurs Russkoi Istorii (The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 comp. by V. L. Ianina (Moscow: Izdatel'stvo 'Mysl'," 1987), 9 vols.。

諾夫，以介紹俄國莫斯科史學派的史學主張與演變，並冀圖進一步略窺俄國十九世紀史學發展之大概。

貳、俄國傳統史學的末代宗師——卡拉姆金

在俄國傳統史學發展的長期過程中，政府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僅鼓勵年鑑史著的編纂、網羅國內外著名史家，並且成立研究機構、公佈暨資助檔案的編輯等等。因此，俄國傳統史學為政治服務的色彩也相對的較為濃厚。(註10)此外，自十八世紀初，俄國政府敦聘一批日耳曼史家至首都聖彼得堡，協助俄國史學之發展，不僅使俄國史學深受日耳曼史學之影響，該學派在俄國史學界造成的迴響或反應，也都足以刺激俄國本土史學的長足發展。(註11)此後，又值歐陸多事之秋，於是各種運動、主義均逐漸滲入俄國，譬如德國的浪漫主義、法國的啟蒙思想，乃至法國大革命，在在引導與刺激俄國傳統史學的發展。本節即擬以俄國傳統史學末代宗師卡拉姆金為例，討論俄國傳統史學之史觀與史學議題，以作為討論莫斯科學派大師柯留契夫斯基史學觀念的基礎，蓋柯留契夫斯基史學對卡拉姆金而言，亦含有相當傳承的性質。

卡拉姆金生於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II, 1762-96)盛世的末期。當時的社會與政治均已出現普遍不安的現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普加契夫叛亂(Pugachev Rebellion, 1774-75)，更是震撼統治階級與智識份子。當統治普

註10 Mazour, pp. 21-22, 70。

註11 例如早期受俄國政府應聘而到聖彼得堡的日耳曼學者穆勒(Gehard Friedrich Mler, 1705-1783)與舒勒茲(August Ludwig von Schl,osr1735-1809)。他們提出羅瑞克(Riurik, 係北歐維金族王子)為俄國創建者之說，該說意味著俄人建國乃得自諾曼人之助。此說引起俄國本土學者極大之反感，因而援引大量史實檔案以駁之。此即俄國早期史學界的重要議題之一——「諾曼主義」(Normanism)；參見 Mazour, pp. 41-47。

英在尋找解決方案時，身為莫斯科大學史學講座的卡拉姆金遂提出「唯有向歷史中搜尋，方能發現線索」的理論。他認為史學的目的即在從過去中瞭解現在，進而為未來提供案例。(註12)事實上，這種論調即是繼承俄國史學「歷史為政治服務」的傳統。(註13)

卡拉姆金早年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信徒，他信服於該運動的「教育萬能」說，尤其是強調歷史教育。卡氏相信歷史教育可以培養人民對自身民族過去與傳統的瞭解，進而刺激民族自尊與愛國情操。(註14)基於歷史的重要功能，卡拉姆金遂主張史家應負有對歷史事件、人物應有道德裁判的責任。(註15)

隨著時勢的流轉，卡氏逐漸退縮，終於轉入保守陣營。其間的轉捩點就是法國大革命；當時，他正在西歐作實地考察的工作。此後，卡拉姆金對於啟蒙運動的諸多主張均有所保留或修正。例如，在自然律(Nature Law)方面，卡氏轉而強調責任與義務，特別是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他開始主張應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如農奴類，以順應多數人的利益。(註16)不過終其身，卡拉姆金仍堅持演進與進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他所指的卻是和平、自然的演進，並非暴力或革命式的突變。(註17)

在史學通論方面，卡拉姆金相信歷史演進具有不可分割的連續性：人類歷史係由原始社會逐步演進至複雜的專制國家，而強有力且統一的

註12 卡拉姆金曾著有《俄國國家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1816-29)，共十二冊，以及《對古代與近代俄國的回憶》(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 1811)；參見J. L Black, Nicholas Karamzin and Russian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Russian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5), pp. 3, 26, 29。

註13 Mazour, p. 12。

註14 Black, pp. 5, 14, 100。

註15 *ibid.*, p. 99; Mazour, p. 79。

註16 Black, pp. 16, 48, 106。

註17 *ibid.*, pp. 29, 189; Mazour, p. 80。

國家，乃是各族人民努力的最終目標。(註18)在演進的過程中，卡氏認為：各民族可依其環境與需要而選擇最適宜的政治制度，一如俄人之選擇君主專制制度(*autocracy*)。(註19)此外，卡拉姆金主張歷史演進的主導力量來自由少數菁英、英雄和偉人主持的政府。(註20)由此可見卡氏的英雄史觀與國家史觀之一斑。

在討論反映時代問題的一些史學議題上，卡拉姆金的態度也相當保守——他支持現狀與既有制度。卡氏相信現存的制度乃是經過長期試煉，終於得以證明契合俄人民的需求，即和平、安全及統一。(註21)但是，卡拉姆金所支持的現行制度，卻是自由派與革命派人士所詬罵的專制制度、東正教和農奴制度。在不同陣營人士的質疑與責難聲中，卡拉姆金僅能以其史學研究的觀點，為現行制度辯護，使之合理化。

在這些頗富爭論性的議題中，卡拉姆金首重俄國君主專制的問題，這也是研究俄國歷史發展的中心焦點。卡氏認為：基於俄羅斯地理位置的缺陷——缺乏天然疆界且位於歐亞交通孔道，外在軍事威脅、安全與和平，遂成為俄國歷史發展的主題之一。為了集中全民力量以有效抗敵求生存，俄國人民不得不選擇符合民族利益的專制政體。當西元862年，俄羅斯人民邀請維金王子羅瑞克(*Riurik of Varangians*)擔任該族統治者時，就顯示了俄國人民已經主動意識到統一、強有力政府的必要性。(註22)嗣後，蒙古人的入侵，導致俄羅斯人民再度集中於莫斯科公國的威權下；混亂時代(*The Time of Troubles, 1598-1613*)也結束於俄民之選擇羅曼諾夫的專制王朝(*Romanov Dynasty, 1613-1917*)。在這長期的實驗選擇過程中，俄羅斯人民也曾嘗試過短暫的民主共和政體，諸如諾弗哥羅的維

註18 Black, pp. 102, 187。

註19 *ibid.*, p. 15。

註20 *ibid.*, pp. 44, 118; Mazour, p. 78; *Encyclopedia*, p. 437。

註21 Black, pp. 74, 165, 188。

註22 *ibid.*, p. 41。卡氏的主張顯示：他雖接受「諾曼主義」的學說，但卻強調俄羅斯人民的主動性。

琪制(veche of Novgorod)，(註23)但最後都遭到夭折的命運，足以證明共和政體並不適合俄羅斯民情的需要。(註24)當然，卡拉姆金對於專制政體的偏好，也源於他的政治理念：唯有專制與法律方能控制人性的弱點，也唯有在專制政體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與平等。(註25)

卡拉姆金對專制政體的堅持，也表現在他對俄國歷史的分期與通則的解釋上。他以中央政權的興衰與專制政體發展的程度為標準，將俄國史分為若干期，例如九、十世紀為專制國家形成期，十一世紀至蒙古入侵為封建領主期，十五、六世紀為專制政體完成期等等。其次，基於此一標準，卡拉姆金對俄國歷史的發展抱持著樂觀的看法。他相信：俄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如蒙古入侵與混亂時代，咸以好的結局收場，也就是專制國家的重建。也因為此一理念，卡氏對於蒙古入侵持有肯定的看法。他認為蒙古入侵，不僅摧毀了舊有的封建大公國，尚能促進俄國人民的愛國意識，終於導致俄人的復國，因為蒙古入侵的成功以及俄羅斯的滅亡，實源於俄人缺乏強有力的君主政府。(註26)卡拉姆金對專制政體的偏好，也表現在他對莫斯科的喜愛上。他曾表示過他之所以偏好莫斯科，乃是因為莫斯科是俄國專制政體的發源地。(註27)

不過值得注意的，卡拉姆金雖然迷信專制政體，卻反對個人獨裁。他主張理想的專制政體，應是君主與貴族共治天下的開明專制局面。因為，卡氏堅信貴族是全國中唯一受過良好教育，且具有理性的菁英階級。(註28)僅管卡拉姆金也承認專制政體可能會較殘酷，但對他而言，殘酷

註23 *ibid.*, p. 105。維琪原係諾弗哥羅大公國的市民大會，多由商人階級組成。該會職責在決定大公國的一切事務，政治、外交咸在其內。

註24 Black, pp. 93, 103-04, 110, 117。

註25 *ibid.*, p. 42。

註26 *ibid.*, p. 45; Mazour, p. 82。

註27 Black, p. 82。卡拉姆金曾任莫斯科大學史學講座。

註28 *ibid.*, p. 113; Mazour, p. 80。

總比衰弱、亡國要好的多。(註29)

卡拉姆金對於東正教亦持肯定的態度，但討論的篇幅遠不及國家與農奴問題，因為東正教並未構成俄國政治的威脅力量。在農奴問題方面，卡拉姆金曾聲稱：在感情上，他支持農奴的解放，但基於理性考量，他卻必須投以反對票。卡氏所謂的理性考量，首先是他認為農奴並未受過教育，知識水準過低，故缺乏行使自由的資格，也就是說：農奴尚未準備好接受解放的權利。(註30)其次，俄國土地均屬於仕紳、軍紳(dvorianstvo, gentry)所有，是仕紳、軍紳為國家服務的酬勞。由於彼輩正為國家服務，無暇照顧土地，因而需要農民為他們服務，好使仕紳、軍紳專心為國服務。據此，卡拉姆金遂斷言：若任意解放農奴，國亦將亡矣。在此情況下，解放農奴對於農民亦毫無利益可言；他們即將因失去庇護而淪陷深淵。(註31)

卡拉姆金雖基於國家利益的理由而反對解放農奴，但他仍主張理想的農奴制度，應是講求道德的平等，而非社會物質的平等。(註32)另一方面，卡拉姆金堅持俄國並沒有階級分化與衝突的問題。他認為俄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整體，所有的人民與階級皆相依互助以求民族之生存。事實上，卡氏否認歷代的農民叛變係源於階級利益的衝突。他堅信俄國的階級關係是和諧與互賴的，叛變則起因於專制政體的失序，以致沙皇不能有效控制、管理其下之官吏。因此，官吏的濫權方是人民叛變的主因。(註33)

雖說卡拉姆金是保守派的大師，但他仍比斯拉夫本土派具有前瞻性與寬容性。卡氏雖也強調俄羅斯民族的獨特性，並預言俄國專制政府終

註29 Balck, p. 120。

註30 *ibid.*, pp. 26, 189。

註31 *ibid.*, p. 76。

註32 *ibid.*, p. 12。

註33 *ibid.*, pp. 52, 121, 127, 153。

將位居世界的領導地位，然而他也堅持俄國歷史實為歐洲歷史的一部份；俄國歷史應置於世界歷史的脈絡中研究。(註34)另一方面，卡拉姆金也斥責西化派的全盤西化論。他主張西方的理性主義與各種新知識，應與俄羅斯民族的特性和需要相結合。唯有如此，俄國才能避免步上西方文明自我毀滅的命運。(註35)由此可以證明：卡拉姆金之轉趨保守，實是深受法國大革命的刺激。

總括來說，卡拉姆金對俄國歷史的解釋可以分為下列數點：(一)俄國歷史的演進是和平、漸進的，並非暴力的；(二)俄國歷史發展的趨勢是集權化、統一化，也就是向心力的發展模式；(三)菁英統治的專制政治是俄國歷史發展的動力；專制政體是應俄國民情需要而發展出來的，也是經過俄國人民主動選擇及共同支持產生的；(四)農奴制度也是在同一民情需要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五)促進歷史前進的主導因素，是英雄偉人而非群眾運動；(六)人類進步是普遍與自然的規律，非人力或暴力所能抗拒與干預的；(七)歷史具有務實的功用，故須賦予道德的意識與批判。

最後，卡拉姆金非常強調史著的表達與史料問題。他主張舉凡傳說、文物、檔案，無論本國或外國的，均宜視為可用的史料。(註36)又由於歷史的借鑑功能，史家尤應注重文理的表達方式。卡拉姆金認為史家最佳的表達方式應是文學式的，因為筆法流暢優美方能引起眾人的注意。卡氏本身即是當代著名的文豪，他的著作也充滿了文學氣息，故流傳頗廣。卡拉姆金遂有俄國史學界的藝術家之稱。(註37)

註34 *ibid.*, pp. 54, 59, 152; Mazour, p. 77。卡氏並預言：國際主義終將取代狹義的民族主義。

註35 Black, pp. 14, 55。

註36 *ibid.*, p. 45。

註37 *ibid.*, pp. 38, 40; Mazour, p. 81。

參、莫斯科史學派的一代宗師——柯留契夫斯基

十九世紀的俄國，是一個充滿希望與失望的動盪時代。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45-55)的失利，刺傷了俄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但也開啟了一連串的改革運動。然而時勢的迅速移轉與西力的衝擊，凸顯了政府領導的改革運動，非但不夠徹底且失敗，因而加深了人民的失望。居於社會菁英的智識份子，轉而主張採取更激烈的手段，並要求徹底的政治與社會革命。

例如，1861年的農奴解放運動，雖然將農奴自貴族控制中解放出來，卻又將其移至官僚控制的公社下。他們仍然沒有享受到法律上的個人自由權，反更陷入無人關懷的真空狀態，終於造成「社會的無政府狀態」(social anarchy)。另一方面，貴族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以補償土地和經濟的損失。此外，空前的工業化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勞工問題。領土的擴張也不止造成俄國國際地位的孤立，更加劇了種族問題。(註38)這些問題在在證明由上而下的改革無效，而俄國內部也的確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階級利益的衝突。於是，新生代的智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生，開始致力研究社會、經濟問題。促成俄國智識份子正視社會經濟問題的動力，不僅來自內部情勢的轉變，還受到西方思潮的衝擊。彼時適逢西歐是百家雜陳的時代。於是，各種新思潮均各循管道輸入俄國，引起相當的迴響，諸如德國的浪漫主義、民族主義，黑格爾、康德、馬克斯等人的思想，以及英國溫和的費邊思想等等。

在這種社會動盪、思想奔放的环境下，俄國史學亦有突破性的發展。新生代的史家開始熱烈的討論社會經濟問題，不再侷限於政治國家範疇內。各種思潮提供了史家不同的解釋與分析的工具。事實上，俄國史學一直深受西方史學與思想的影響。相對於俄國的，此時的歐洲，尤其

註38 有關相關的時代背景，參見 George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8th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18-34。

是德國，早已開始重視到經濟發展在歷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註39)於是乎俄國史學的轉向，實不足為奇——莫斯科大學史學派的一代宗師柯留契夫斯基，便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柯留契夫斯基生於貧窮的牧師之家，父早逝。因家貧，柯氏祇得進入免費的神學院修業，嗣後因成績特優，方有進入莫斯科大學的機會。柯氏長於俄國邊遠的小鎮奔薩(Penza)。該鎮原為抵抗莫達瓦(Mordava)等異族侵略而建造的軍事城鎮。該地氣候惡劣，物產貧瘠，民性剽悍。俄國歷史上幾個著名的民變，就是發生在這裡，譬如1670年的聖卡拉金(Sanka Razin)之亂與1774年的普加契夫之亂。因此，柯留契夫斯基自小就應深深體會到自然環境對人民生活與性情的影響。無怪乎在他的史著中，每當描寫到人物個性時，總不忘多費筆墨於該人物生長的自然環境。(註40)

當柯氏抵達莫斯科時，正值頒佈農奴解放令，出身於特權階級的智識份子紛紛要求政治權利，以致莫斯科的學生情緒激昂，學生運動無日不有。況且，莫斯科也是俄國工業重鎮之一，勞工問題更是加劇了當地的階級衝突，社會問題隨之嚴重。經濟、社會問題對柯留契夫斯基所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

在莫斯科大學受業期間，柯留契夫斯基深受二位業師影響。一位是重視語言學之社會功能的布斯拉也夫(F. J. Buslaev)。布氏也強調在歷史流程中，人民的精神與物質企望才是基本要素。(註41)另一位則是當時的史學大師索羅維也夫。索氏堅持歷史流程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故反對傳統機械式的分期法。(註42)他也主張唯有經過事實檢驗的思想才能長留久

註39 參見李國祁師，〈史學理論與方法講義〉(未刊)(1990年3月28日)。

註40 如十七世紀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歐頂(A. L. Ordin-Nashchokin)；參見 Kliuchevsky, pp. 360-62; Mazour, p. 130。

註41 Kliuchevsky, p. xxii。

註42 Mazour, p. 115。

存。(註43)在研究俄國古代史方面，索羅維也夫強調莫斯科公國的興起與其領袖、戰略地理、豐厚的物質資源等有密切的關係。此外，索氏也認為俄國的落後及中央權威的興隆，咸與俄國之自然條件有密切關連。(註44)事實上，這種強調政治地理的史觀，實為莫斯科史學派的一貫主張。

在二位業師指導下，柯留契夫斯基的博士論文，即在探討貴族會議(Boyar Duma)的興起與演變。在結論中，柯氏強調政府、國家皆是人民運動的產物，國家形成後又轉而領導人民運動。柯氏因而推論：若非研究庶民歷史，則無法瞭解歷史的全貌。(註45)這篇論著頗受當時史學界的推崇，柯留契夫斯基遂能於其師索羅維也夫死後，繼承他的史學講座職位。柯留契夫斯基由於善於表達，故即使是最大的演講廳，也是座無虛席。柯氏任教，常給予學生相當大的討論空間，因而訓練出不少名徒，從政客到史學家都有他的門生。柯留契夫斯基教學期間，不輕易著書，但經常更換教材，且相當重視課前準備。他的晚年，學生將彼上課講義整理，請求出版。柯氏經一再修改後始允出書。但書尚未成，柯留契夫斯基卻與世長辭了。爾後，該書一再再版，甚至蘇聯政府也再予以出版。這是少數由蘇聯官方出版的「資產階級史學」著作之一。

柯留契夫斯基除了重視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經濟和心理因素外，對於俄國史學理論也有頗多貢獻。當代史家多崇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使史學逐漸脫離實證範疇。柯留契夫斯基獨排眾議，呼籲史家所研究的不是人類的靈魂(soul)，而是實際檢驗各事件間的相互關連與發展。(註46)他並且提出善意的警告：歷史經驗所隱含的空泛思想並不能流傳世

註43 Kliuchevsky, p. xx。

註44 Mazour, pp. 116-17。

註45 Kliuchevsky, p. xxiv。

註46 *ibid.*, p. xxxiii。

代，唯有通過事實的檢驗，才能有所成就並長留久存。(註47)他堅持史學研究有其獨特性，意即史學的最終目的在尋求人類社會發展的通則。因此，史家的任務即在褪去史實的層層外衣，以求取人類行為最深層的泉源。(註48)史學的獨特性就在於它研究的對象與眾不同。史學是研究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卻是人類生活發展的結果。人類生活、活動即表現在各種不同的關係中。這些生活與關係又受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與刺激，因而構成一個極為複雜的畫面。史家必須掌握一些基本的動力——個性、社會、自然環境，進而從歷史事實的現象切入。對柯留契夫斯基而言，歷史事實即是人類生活與各種關係的表象或現象。柯氏認為造成史學研究困境的主要原因則是：影響人之生活的多種因素可以有不同的組合，而每一個時代的組合也迥然不同，卻自有其整體性及持續性。史家的困難和工作，就是在如何掌握這些因素間、事件間，以及因素與事件間的相互關連。另一方面，柯留契夫斯基建議：史家最宜採用的方法應為「由果析因」、「由果溯源」，此乃因為史家是從歷史事件的表象入手。(註49)

除了強調歷史發展的多元因素外，柯留契夫斯基在其著作中，還不時強調偶然事件與個人因素的影響力。例如，俄國沙皇恐怖依凡(Ivan IV, 1533-98)絕嗣的偶然事件，卻導致了影響俄國日後發展的混亂時代。另一個偶然產生的市民大會(zemskii sobor)，卻成為俄國歷史上的民主共和的實驗品，它的失敗又導致了專制政權的復興。(註50)又如俄國十七世紀的宗教大分裂(The Church Schism, 1666-67)，實非源於宗教改革或是教義的歧見，卻是出於兩位大主教的個人恩怨。這次宗教分裂，不僅促使東正

註47 *ibid.*, p. xx。

註48 *ibid.*, pp. xv, xxix。

註49 *ibid.*, pp. xxviii, 5, 26, 60; Mazour, p. 132; *Encyclopedia*, p. 544。

註50 Kliuchevsky, pp. 50, 226。

教喪失了政治影響力，尚為未來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運動，削弱阻撓的傳統勢力。(註51)

柯留契夫斯基相信：即使是同一因素，其影響力也不是直線型的。以心理因素為例，他主張還應考慮到個人、社會群眾、民族心理等等的差異性。再以混亂時代為例，當時為何會有多位假冒恐怖依凡私生子迪米特里(Tsarevich Dimitri Ivanovich；俄史上稱之為「假冒事件」，"Pretendership")的出現？該事件實與當時的社會心理有關，即人民排斥新思想的出現，藉以表示對上層社會的不滿。在此，柯留契夫斯基也強調俄國與西方的差異。例如，俄人視平等為道德意涵上之平等，而非如西方所追求的物質平等。(註52)在討論宗教分裂問題時，柯氏對於俄人民族心理，也有極深刻之描述與分析。(註53)再者，柯留契夫斯基也建議：心理因素也並非全是邏輯反應，有很多實是感性的。(註54)柯氏每每在分析事件或人物的心理因素時，總是著墨特多，並注重各種角度的周延性，除了物質層次的自然、經濟等因素外，還包括個人成長經驗可能產生

註51 *ibid.*, pp. 325-30。此二位大主教，一為保守的 Archpriest Avvakum，另一則是尼康(Patriarch Nikon)。尼康受希臘影響頗深。他發現俄國通行的聖經與聖畫(icon)與希臘的版本頗多歧異，遂下令銷毀所有的聖書與聖畫，另易以新校訂的版本。此舉引起保守派(即本土派)的極端不滿。他們認為此舉意味著：俄國數千年來的東正教都是錯誤的，其影響將難以估計。因為，保守派一直視俄東正教為最純淨的基督教，且以「第三羅馬」自詡。保守派並相信：羅馬與君士坦丁堡(即「第二羅馬」)皆因背叛基督真義而亡。更有甚者，當時的希臘正教正企圖與西方的羅馬政教妥協與統一。故俄國保守派與大部分的人民視希臘正教已淪陷，並為西化的象徵，遂極力反對尼康之舉，終造成俄東正教的分裂。分裂後，保守派被稱為舊教派(Old Believers)。

註52 *ibid.*, p. 60。

註53 *ibid.*, pp. 153, 336, etc.。

註54 *ibid.*, p. 307。

的潛在影響。

柯留契夫斯基雖極力強調群眾運動的重要性，認為在國家出現以前，群眾行為早已使社會組織定型了，其後，國家政府的功用僅在調和各階級團體的不同利益。他的這種說法，與傳統的俄國史家有所不同。(註55)柯氏曾言：君主與國家都是短暫的，祇有人民才是永恆的。(註56)然而，他顯然仍是重視群眾運動中的特殊人物，譬如英雄、偉人等。在他的著作中屢屢提及：混亂時代的出現，乃是源於沒有英雄人物的領導。(註57)柯氏強調：每個時代都有一些對於該時代問題特別敏感的人物，他們或能為後代留下深刻的時代感觸，或能為當代提出解決方案。例如，亞歷克斯耶(Mikhailovich Alexei, 1629-45-73，即彼得大帝之父)時代西化改革的成功，實應歸功於三位人物——沙皇，及二位大臣歐頂(Afnas Lavrentievich Ordin-Nashchokin)和爾提謝夫(Feodor Mikhailovich Rtishchev)。因此，柯氏著作中，對他們均有專章介紹。(註58)居於此一信念，柯留契夫斯基時常指責歷代沙皇暨其臣僚，應為俄國的落後負責。因為他們不能預見時代的問題，往往當事件臨頭時才病急投醫，西化改革即為典型的例子。彼輩沙皇與臣僚又缺乏慎密的計畫，終致犧牲了人民的自由，尚不能製造改革的成效。(註59)無論如何，由柯氏的這些主張，可以窺知他仍抱持傳統的英雄史觀。

在解釋俄國歷史發展方面，柯留契夫斯基除對一些重要議題提出獨特見解外，尚試圖從中發現俄國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首先，柯留契夫斯基承認：俄國歷史因其獨特的自然環境，而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特例。其間或有一些因相互影響而產生的相似點，然大部分的相似點，卻是

註55 *ibid.*, p. xxi; Mazour, p. 132。

註56 Mazour, p. 136。

註57 Kliuchevsky, p. 64。

註58 *ibid.*, pp. 281-390。

註59 *ibid.*, p. 8。

不同文化在異時異地，或同時異地的條件下，偶然發展出來的結果，俄國東正教的改革即為一例。(註60)對於柯氏而言，俄人因自然條件太差，以致不得不頻頻向外擴張與殖民，但是貿然的擴張，或過於迅速的擴張，又造成時代問題。譬如，為了防禦邊疆與集中資源的需要，專制政權與特權的貴族、軍紳階級於焉而起。(註61)另一方面，生活的困境，迫使俄人或政府汲汲於解決一波波的難題，以致無暇思考與規劃，僅能急病投醫，採取部份且不徹底的改革，導致新問題叢生，改革運動終致失敗。這也是柯留契夫斯基對彼得大帝西化改革運動的批判——缺乏周詳的計畫與全盤的考量。(註62)

在俄國歷史上的幾個主題中，柯留契夫斯基首先想要探討混亂時代民主實驗的失敗、集權制度的復興，及該制度下的人民與國家的關係。混亂時代曾數度召開市民大會決定國家大事，甚至選舉了新的沙皇——羅曼諾夫王朝，但終告曇花一現。柯氏認為除了前述的個人、偶然發展與自然環境因素外，最主要的則是源於市民大會係一階級競爭的產物：上層的貴族力求保障自身地位與財產之安全，中下層貴族欲藉下層社會要脅上層貴族讓步，群眾則冀圖爭取參政權。這些階級利益的衝突，致使市民大會制定的憲法，毫無民主真義可言，也非攸關國家的福祉利益。(註63)在階級競爭中，農民階級最先把犧牲出局，隨即下層貴族因缺乏籌碼而喪失影響力。最後，市民大會變成了一言大會，以及分攤失敗責任的機構，大會也因癱瘓而瓦解。(註64)其次，混亂時代雖然出現許多革命性的理念，包括市民大會所代表的民主思想，但是由於群眾的思想跟不上事件的發展，故對於新思想、新理念採取疑懼的態度，終於又退回

註60 *ibid.*, p. 260。

註61 *ibid.*, pp. 97, 128, 159, 315; Mazour, p. 137; Encyclopedia, p. 544。

註62 Kliuchevsky, pp. 49, 271。

註63 *ibid.*, pp. 37, 220。

註64 *ibid.*, pp. 202, 214。

了傳統中——選擇了一位與前王朝有遠親關係的沙皇，再度建立了專制政權。(註65)當然，波蘭、瑞典等國的外力干涉，也是促使俄人回到專制體制的原因之一。(註66)

新建的王朝，雖然經過人民的選擇，卻未有助於民權的發展。相反的，新政權的產生卻象徵著人民自由的淪喪。新政權在外敵環伺下，但求助於開發國家資源、控制國家稅收，以及爭取上、中層階級的支持。另一方面，混亂時代中，農民大量逃亡，或遷徙到邊區如北方森林區或南方烏克蘭區(Ukraine)，以致莫斯科政權所在的核心地區勞動力大量流失，導致貴族大受損失。於是，貴族以此為交換條件，要求以立法方式限制農民的流動遷徙。中央政府為了得到貴族的支持，祇得將農民撥給貴族使用、管理，並將其固著在土地上。從此，農民喪失了法律人格，淪與牲畜無異，農奴制度遂得以形成。(註67)嗣後，莫斯科政府又為了爭取中層仕紳階級從事軍事等國家服務，再度將農民的勞動力作為酬勞與補償的代價。在原先的設計中，國家祇是將農民勞動力暫時借予中上服務階級使用，然而不久之後，這種暫時性的所有權卻演變成永久性的所有支配權。(註68)於是，俄國的國勢與經濟發展乃與人民的自由成反比。(註69)此外，由於缺乏有效管理的技術和能力，俄國政府遂將農民管理權、稅收權交予貴族代理。此後，代理之意漸失，再加上濫權，終致自由農民階層的消失。(註70)值得注意的，柯留契夫斯基在研究農奴制度的形成與演變時，一再指出：農奴制度的產生先於制度的立法過程；法律制

註65 *ibid.*, pp. 11, 54, 83, 91。

註66 *ibid.*, pp. 52, 89。

註67 *ibid.*, pp. 156, 169, 182; Vernadsky, pp. 174-76。

註68 Kliuchevsky, pp. 182, 187; Mazour, p. 134。柯氏也承認：債務也是造成農奴制度的原因之一。

註69 Kliuchevsky, pp. 5, 56。

註70 *ibid.*, pp. 169, 196。

度祇是承認既成事實而已。(註71)足見：柯留契夫斯基注意到法律制度的社會涵義。

農民階級的嚴重萎縮與消失，對俄國歷史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即專制政權得以強化與完成。農民本是君主與貴族間的平衡勢力，也是雙方相互制衡的籌碼。(註72)然而自農民階級消失後，貴族祇能日益仰賴君主，貴族不能再利用農民要脅君主，以致君權日盛。同理，君主必須面對權力日張的貴族，君主被迫以專權方式自固其位。(註73)更重要的，農奴或下層階級不再信任貴族，他們從此只能藉助叛亂，以表達不滿的情緒並爭取政治參與權。此一結果，就是俄史上的民變無數。同時，由於農民的傳統傾向，統治階級便將傳統、民變、分裂等視為同義辭，於是更加立意西化改革，亟欲擺脫傳統，終造成統治階級與群眾的脫節與孤立，社會分化也日益嚴重。(註74)

從上述柯留契夫斯基對農奴制度、專制制度和民變得分析中，不難發現柯氏對於社會階級與利益衝突的強調。但實際上，柯氏非常反對階級衝突論，謂其將造成社會分化與不安。(註75)他主張社會秩序應建立在各階級間的相互權利與義務上。(註76)柯留契夫斯基在探討俄國社會階級形成的動力時發現：社會階級源於不同的服務價值觀，不同的服務團體形成不同的社會階級。個人與階級的政治地位，則取決於彼等對國家之義務與服務的差異性。例如，在外敵壓力下，為國家直接服務的團體，如軍紳或籌謀運糧的貴族者流，往往被視為最具重要性且應享有特權的階級。事實上，柯氏相信：莫斯科公國早先立法的真義即在分配義務，

註71 *ibid.*, p. 190。

註72 *ibid.*, pp. 58, 193。

註73 *ibid.*, p. 202。

註74 *ibid.*, pp. 39, 41, 142, 258, 341。

註75 *ibid.*, pp. xxxii, 253; Mazour, p. 135。

註76 Kliuchevsky, p. xxxii。

而非保障特權。(註77)因此，他得到的結論是：在外力壓境下，俄國內部不同的人口成份被迫搏成一體，俄國歷史的過程就是該體形成的過程。(註78)

受到西方民族史學的影響，柯留契夫斯基也不例外，但他應算是一位理性的民族史學家。首先，柯氏承認一個民族應是一個政治單位，然卻反對狹義的民族主義。(註79)在檢討俄國落後的原因與混亂時代的貢獻時，柯留契夫斯基認為：混亂時代俄領土的過度與迅速擴張、宗教自信等，(註80)促使俄民族自信心過度膨脹。過度的自信心導致了排外心理，以致不能接受任何新事物、新思想，進而反加速了民族的落後。(註81)不過，柯留契夫斯基仍堅信：俄國對未來世界賦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即是東西文明的媒介角色。此一使命亦淵源於俄國的地理位置。(註82)

柯留契夫斯基正處於西化派與斯拉夫本土派爭辯最激烈的時代。此一爭辯不僅涉及俄國未來發展的走向，也觸及俄國史學上頗富爭議的議題，即彼得大帝的改革運動。基本上，柯氏同意西化派與本土派各有所長，彼得大帝的改革大體上也值得肯定。在研究俄國歷史上的改革運動後，柯留契夫斯基發現：每一次的改革運動均始於對外交涉，或戰爭的失利。因為該類行動的失敗顯示出內政的缺失、國內資源不足以支持國家安全等問題。(註83)混亂時代的諸次改革與彼得大帝的改革，都是在此一脈絡下發生的。就這一點而言，這些改革運動均值得肯定。柯留契夫斯基並發現：由於改革運動必須集中國家資源，且由政府領導，因此改

註77 *ibid.*, pp. 56-57。

註78 *ibid.*, p. 9。

註79 *ibid.*, p. 70。

註80 柯氏這裡所謂的「宗教自信」，即指「第三羅馬」說；參見註51。

註81 *ibid.*, p. 315。

註82 *ibid.*, p. 272。

註83 *ibid.*, pp. 8, 134, 276。

革運動的結果也都是君權日張、人民權利日縮。(註84)他還指出：西化改革並不始於彼得大帝，混亂時代一結束後就已經開始西化改革了，因為國內資源不足，俄國祇得向西方求取資源，包括智識、物質與人力等方面的資源。(註85)

若將彼得大帝前的西化運動視為第一階段，即可發現第一代西化運動自有其特性，與後期有所不同，進而可以發現俄國西化運動過程中的某些特性。第一代西化運動主要是指沙皇亞歷克斯耶時代。該時代的西化改革家比較審慎與猶疑。他們雖然意識到西化對國家生存的重要性，卻又不願放棄傳統，尤其不願見到西方思想侵入俄國傳統的精神生活中。於是，他們選擇最重要，又不涉及思想層面的軍事科技為西化的起點。(註86)因此，第一代的改革家仍立足於傳統中，他們仍保有傳統的思惟方式。然而，外在的模仿將會導致內在的潛移默化，舉凡生活方式、訓練方式的仿效，都會造成思想的轉變。這種情形在第二代——彼得大帝——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也因此才有彼得大帝的全盤西化運動出現。(註87)柯留契夫斯基的這種論點，頗值得與中國近代西化運動相比較。

對柯留契夫斯基而言，俄國西化改革運動最大的貢獻，在於轉變了俄國統治階級的傳統觀念。在傳統觀念中，俄國統治階級只知榨取人民的勞動力而不知開源。現在在西方影響下，俄國統治階級也意識到促使人民世俗化的重要性，以及瞭解到知識可以使人類的生活變好，而開始追求該種知識。(註88)然而，柯留契夫斯基仍斷言：俄國的西化運動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在於領導的君主只知盲目的西化，特別是彼得大帝，西化時沒有全盤的計畫，並且過於相信政府的力量與能力，反而忽略了人

註84 *ibid.*, p.139。

註85 *ibid.*, p. 137。

註86 *ibid.*, pp. 282-83, 343。

註87 *ibid.*, p. 293。

註88 *ibid.*, pp. 371, 386-87。

民的力量與反應。(註89)因此，西方的影響力儘管強烈，卻得不到人民的感情與認同。人民對於西方事物、思想的疑懼，不止阻礙了改革的進展、加深了政府與人民間的鴻溝，更造成民變與分裂。人民藉著民變表達對西方的抗拒或懷疑，宗教的分裂就是一例。(註90)

總結柯留契夫斯基的史學成就時，不難發現他的史學理論實深受時代背景、思潮，與個人生經驗的影響。他雖強調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社會經濟發展與歷史流程間的相互影響，但他並未忘懷其他的因素。實際上，柯氏所提出的乃是多元因素發展論。誠如他對第一、第二代西化運動的分析，他自己就是第一代的最佳代表——放眼於新思潮，卻立足於傳統中。在他身上隨處可見傳統的影子。例如：(一)他對和諧的社會關係與和平演進的肯定及維護。柯氏雖承認民變的存在，卻不認為是歷史的主流。對他而言，民變只是人民政治抗議的一種形式，對歷史發展影響不大；(二)柯留契夫斯基對責任與義務的支持，他認為社會階級就是由這二者造成的；(三)柯氏同意集權與統一是俄國歷史發展的趨勢。並且，基於艱辛的自然條件，這種趨勢也是必要的；(四)柯留契夫斯基也服膺於傳統的英雄、君王史觀；(五)柯氏也同意史學需要道德意識存在，但應是務實的，而非空泛的道德標準。

柯留契夫斯基與傳統史家不同地方，首先在於他承認歷史並非受單一元素支配的單線式發展。歷史的發展有如有機生物體，是由多種因素組成有機組合式的多元發展。它雖包含多元因素，卻不是分割成無數個體成孤立發展形式，而是相互影響，並成整體、連續的網狀發展模式。因此，柯留契夫斯基主張史家應受多種訓練，詳細檢查史料、進行多方檢驗，以求得事件間的關係與原委。其次，雖然柯氏指陳歷史發展的主

註89 *ibid.*, pp. 270-71。

註90 *ibid.*, pp. 278-79, 332。值得注意的，柯留契夫斯基與傳統的俄國史學家對宗教分裂的看法不同。柯氏強調俄國宗教的分裂，並非源於宗教改革，而是起因於人民對西化運動的強烈不滿，而興起的反應。

流與主要因素，卻未忽略歷史發展的支流及次級團體的存在，並且願意以寬容、審慎的態度面對它們。他也就是以這種態度處理群眾運動、農奴制度以及民變等問題。同時，柯氏也能採取一較理性、寬容的態度，而非純感性或道德的角度，重行審視、評估一些史學上較具爭議性的議題。譬如，他對混亂時代的肯定，並非在於它開創了另一個專制王朝，而是俄人在該時代中的民主實驗(儘管失敗了)，以及它使俄人世俗化與對知識的重視和追求。柯留契夫斯基對彼得大帝的改革、西化運動、民族主義、農奴制度等史學議題，也抱持同樣的態度；寬容而理性，且就事件發展之本身而予以評論。

最重要的，柯留契夫斯基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宗師，及在於他能擷取各家各派之所長，並利用流暢、優美的文筆、通俗的事例，將其繁複的觀念表達於世。無怪乎，他會被稱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綜合家。(註91)

肆、莫斯科學派的末代傳人——普拿托諾夫

普拿托諾夫於農奴解放的前夕，生於烏克蘭邊疆的一個小鎮。他的父親是工人，祖父則是農奴。因此，普氏對於俄國社會的不平等待遇與激烈的衝突，有著深厚的感觸。普氏早期肄業於聖彼得堡大學，嗣後方轉赴莫斯科大學，拜讀於柯留契夫斯基門下。1899年，普拿托諾夫成為聖彼得堡大學的史學講座，致力於混亂時代史之研究，該時代在當時尚屬於史學的真真空曠。普氏還致力於中等歷史教育的教科書寫作。史學平民化，是他一生的信念。俄國大革命後(1917)，普拿托諾夫又任職於蘇聯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並參與1920年蘇聯與波蘭的里加條約的簽訂，擔任顧問與專家的職務。1928年，普氏受當局御用史家，也是同門的波克羅夫斯基的忌妒，被誣為「君王派」(monarchist)，即被視為「資產階級

註91 *ibid.*, p. xxvii。

史學」的代表，而非馬克斯史家。波克羅夫斯基也是柯留契夫斯基的學生，後來並繼其師任莫斯科大學的史學講座之職。普拿托諾夫最後被放逐到中亞，且死於異鄉。

普拿托諾夫由於曾遊走於俄國史學界的兩大門派之間，故能各擷其長，融會成一家之言。他的著作重視史料的客觀性，也予以經濟地理的解釋架構。普氏實是繼柯留契夫斯基之後，最多產與博學的一代大師。(註92)

普拿托諾夫頗能繼承其師之衣鉢，於其著作《混亂時代》(Time of Troubles, 1923)之首章，對俄國的地理條件及其與俄史發展之關連大加闡述。(註93)其間，他並強調各地理區域的特質，與其對該區權力滋長之助益與阻力。這種政治地理的觀點，在其書中屢見不鮮。(註94)事實上，誠如普拿托諾夫所自稱的，他的史學觀與著作的基本架構即是：地理影響經濟，經濟支配政治，而政治則影響社會。例如，普氏相信戰爭的起因，就是經濟利益的誘惑與衝突。經濟的誘惑，包括了土地與貿易等因素，其中，普氏似較強調土地的問題。(註95)

混亂時代，也是俄國史上的一個大移民時代。普拿托諾夫對該運動的解釋，也就是在上述的框架中進行的。他認為：促成移民運動的經濟理由遠大於政治理由，經濟的誘惑使得移民運動變成全民運動。對普氏而言，移民運動實為勞力的遷移，其結果即是經濟中心的重新分配，也帶來了許多問題。於是，在利益受損的特權團體壓力下，政府的政治力

註92 Encyclopedia, p. 214; Platonov, pp. xi-xii。

註93 該書俄名為《Smutone vremia》(即混亂時代之意)。於1923年在彼得堡出版。該書實由普氏大革命爆發前的學術巨著《混亂時代》改寫而成。在革命之前，本書即已相當通俗，也最能代表普氏早期的史學主張。大革命後，普拿托諾夫的主張並未有重大的轉變，普氏即因此而獲罪。

註94 Platonov, p. 2。

註95 *ibid.*, pp. 16, 25, 35。

量開始介入，以求解決該團體與國家的經濟困境。此舉不僅影響移民運動的後續發展，更促使王權伸張、國家的形成，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農奴制度的興起與自由農的消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註96)

普拿托諾夫甚至推論：早期的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並非建立於權利、義務或忠誠之上。國家與人民兩者之間只有經濟的關係，政治關係僅是隨時移轉而逐漸形成的。(註97)從這裡已可看出：普拿托諾夫與柯留契夫斯基的相異處，即普氏較強調經濟的因素。

在社會階級的形成與衝突方面，普拿托諾夫也比柯留契夫斯基激進，他比較強調階級衝突。例如，普氏將混亂時代分為三個階段：宮廷鬥爭、社會鬥爭，與民族奮鬥。此三階段環環相扣。宮廷鬥爭中，君主與貴族各欲增加自身的籌碼，乃向人民訴求，人民地位得以上昇。其結果是君主與貴族向庶民讓步，如解放部份的農奴。但這種讓步並不是出於國家或公眾福祉之理想，而是源於個人利益的打算。(註98)另一方面，由於平民缺乏良好的教育訓練，以致形成暴民政治。在對暴民的恐懼甚於外敵的威脅下，貴族遂引進波蘭、瑞典等外國勢力，以抵制暴民。外人的蠻橫卻又刺激貴族與部份人民合作以驅敵，因而結束了混亂時代。羅曼諾夫王朝的出現，就顯示了俄羅斯人民與哥薩克人(Cossacks)的最後勝利，因為該王朝係由後者所選出的。(註99)當和平再度降臨時，人民即喪失了利用價值，加上平民階級缺乏英雄人物和政治理想，故易為君主與貴族犧牲。貴族階級內部的分歧，又予王權擴張之機，終致專制政體的完成。(註100)最後，普拿托諾夫預言：唯有戰爭才能使平民的力量再度提升，因為唯有戰爭方能顯示出群眾的利用價值。但是另一方面，戰爭

註96 *ibid.*, pp. 6, 18, 33。

註97 *ibid.*, pp. 10-11, 172。

註98 *ibid.*, pp. 53, 73, 93, 170。

註99 *ibid.*, pp. 158, 164。

註100 *ibid.*, pp. 21, 83, 87, 90, 96, 98, 117, 120, 130, 135, 166, 174。

雖然刺激了人民力量的興起，卻也顯現出人民力量的不可恃，因而容易導致戰後專制王權的興起。(註101)此一預言在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大革命時，似頗能得到驗證。

在討論混亂時代市民大會的民主實驗失敗時，普拿托諾夫也秉持類似的觀點。混亂與戰爭提升了人民的利用價值，貴族與君主先是被迫召開市民大會以示讓步，但是社會衝突仍無法得到解決，反因市民大會的選舉與爭論而加劇，於是造成民主實驗的癱瘓。等到和平再度降臨時，市民大會議終於隨著群眾的被棄而消失。(註102)

在討論階級衝突與民主失敗時，普拿托諾夫不時透露他的政治理念。混亂既淵源於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因此唯有強有力的君主，始能維持國家與社會的秩序。不過，普氏並非一味的迷信專制王權。他從混亂時代君主的更迭而得到結論：得不到人民支持的王權，必遭覆亡之運。(註103)若想要得到人民的擁戴，君主就必須推行有效的土地與社會福利政策。(註104)足見：普拿托諾夫已意識到土地與社會福利，乃是俄國歷代社會問題的最大根源。

最後，普拿托諾夫認為在混亂時代，俄國居然能免於亡國之命，實在於共同的宗教信仰，將充滿歧異的各階級、人民緊密的搏成一體。他同時肯定宗教的社會福利功能。(註105)另外，一如他的前輩，普拿托諾夫也堅持：俄國並沒有孤立於歐洲國際之外，俄國應該是歐洲主流的一部份。(註106)

從普拿托諾夫的史學主張中，不難發現柯留契夫斯基的經濟社會史

註101 *ibid.*, pp. 114, 124, 136。

註102 *ibid.*, pp. 156, 174。

註103 *ibid.*, pp. 13, 42, 64, 143。

註104 *ibid.*, p. 138。

註105 *ibid.*, pp. 143, 144。

註106 *ibid.*, pp. 103。

觀，傳到第二代已然有機械化的傾向。柯氏雖然強調自然、經濟、社會等因素，卻沒有漠視個人、心理、文化、宗教等其他的相關因素。但是在普拿托諾夫的著作中，至少在他的《混亂時代》中，卻只看到了三元因素論——自然、經濟與社會，而且還是呈機械式的單線排列。甚至宗教，對普氏而言，也僅剩下了一項社會福利的功能。

聯繫柯留契夫斯基與普拿托諾夫間的傳承關係，尚有一些類似的政治史學觀。首先，柯、普二人均肯定強有力的專制君主對俄國歷史發展的貢獻，諸如維持秩序、和平與安全等。但二人所主張的都是開明的君主專制，意即君主必須對平民的需求有所反應。普氏更進一步的明確指出：平民的需求主要是土地與社會福利政策。這可能與他曾經歷沙皇制度的覆亡與俄國大革命有關。其次，柯普師徒二人也都堅持英雄史觀。雖然他們在討論社會階級的衝突，然均侷限於事件過程中的英雄角色。事實上，他們對於群眾運動仍抱持懷疑與否定的態度。普拿托諾夫更明言：平民只有破壞的力量，缺乏創造的能力。(註107)柯留契夫斯基也曾揚言：具有遠見的偉人與政治家，才能促進歷史的積極進展。普氏則顯然將英雄的範圍擴大到君主與貴族合作的團體。第三，柯普二氏也都堅持俄國是西歐歷史發展的主流之一。這意味著他們均支持西化改革運動，反對本土的排外傾向。最後，普拿托諾夫雖未有系統的討論史著的筆法，但從他屢次為中等教育撰寫教科書，同時將其學術巨著改寫為平民化的著作來看，即已顯示普氏也主張史著的文筆宜流暢易曉。這也證明：他們師徒二人都贊成史學平民化，如此方能發揮歷史教育的功效。

註107 *ibid.*, pp. 168。

伍、結論

由上述「祖孫」數代的史學大師主張中，可以明顯發現：史學發展的本身即受時、空、人三因素的限制。在這三項基本元素的交錯影響下，史學派的內部也發生了流變。然而，經過傳承的運作，學派的外觀仍能表現出整體與連續性。俄國莫斯科大學史學派即是如此。誠如該派所主張的：事件是呈整體、連續、有機的形式向前發展，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間的流變不僅受內在因素的影響，也受外在時空等環境因素的限制。

大體上，莫斯科史學派的三位大師均同意：(一)自然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力；(二)驅使人類歷史前進的主要動力，實係英雄、偉人等個人因素，而非群眾；(三)人類歷史的演進是不可避免的，也非人力所能抗拒的。歷史的演進是和平與漸進的，雖然偶有暴力事件出現，但僅是特例，對於歷史演進的大趨勢並無妨礙；(四)各事件、史實間的關係是互賴的，並具有整體與連續性；(五)史學應有務實的功用，例如為當代問題提供解決的線索。故史學與史家均應有道德意識的涵養；(六)史學不僅應注重史料的蒐集，更應著重史料的批判與解釋；(七)史學應平民化、世俗化，方能收其務實之效。於此之故，史著的文筆應力求流暢、優美。受因素的影響；(八)集權、中央暨統一化，乃是俄國歷史發展的趨勢，亦即專制政權的完成；(九)俄國歷史與文化咸係歐洲歷史發展的主流之一；俄國歷史並非孤立發展的。因此，西化改革歷代有之，非始於彼得大帝時代。

然而，在約一百年的光陰中，俄國的社會、政治均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業革命與農奴解放，這兩個運動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他們多出身寒微，但憑自身的努力終得以嶄露頭角。即以史家為例，索羅維也夫、柯留契夫斯基皆出身於低階貧寒教士之家，普拿托諾夫甚至是農奴之孫、工人之子。因此，他們更能感受到物質因素對歷史、社會、政治的強勢影響力。同時，他們也親身目睹到政府在群眾

的壓力下，逐步讓步並推行改革政策。他們也深深感受到動盪時代中社會階級利益的衝突與對立。另一方面，在新思潮的洗禮下，他們也躍躍欲試，企圖以歷史發展的案例來驗證新的思潮，或將新方法應用到史學研究之上。更重要的，這些新思潮大部分來自西歐，俄國史家的努力似頗有與其西方同僚相呼應或抗衡之意。於是，在這種複雜多變的環境下，莫斯科史學派內部發生了流變。

莫斯科史學派的流變，大致可分為數點來介紹。首先，精神層面的因素逐漸減弱，對傳統的擁護也日益薄弱。當卡拉姆金時代，他尚堅持傳統的精神文明，深恐西方文明將腐化或污染俄國文明。到了柯留契夫斯基，就已鮮少稱揚傳統文明的偉大，普拿托諾夫的著作中，更難見到「傳統文明」的字樣了。同樣的，道德裁判、宗教與心裡等精神因素，在莫斯科史學解釋中的比重，也與日遞減。到了普氏時代，幾乎只剩下了物質層面的因素。因此，莫斯科學派所主張的多元有機論，到了俄國大革命的前夕幾乎已成了一元機械論，這無異為未來蘇聯的馬克斯教條史學鋪下坦路。

其次，由於出身的關係，莫斯科學派中對中下層社會階級的關懷也與日俱增。卡拉姆金仍視農奴制度為理所當然，反對解放農奴。柯留契夫斯基卻以既嚴肅又關懷的態度處理該種問題。他認為農奴制度的形成，貴族實有濫權之嫌。普拿托諾夫則更以層疊累牘的篇幅敘述平民的活動，包括民變在內。他進而指責貴族為農民階級的背叛者。然而，普氏與後來的蘇聯教條史家仍有所別：普氏仍堅持群眾的缺乏遠見與創造力，實不足以領導歷史的前進。

第三、在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方面，莫斯科學派後期的學者多服膺於契約論，認為權利與義務乃是該種關係的基礎。這種理念顯然揚棄了卡拉姆金的無條件支持論。柯留契夫斯基似乎已同意：若君主未能履行責任，人民可以有限的叛亂以表達其不滿情緒。普拿托諾夫更明白指出：沒有人民支持的君主必敗，君主的政策亦應以人民社會福祉為重。由此

可見，儘管他們仍贊成專制王權，卻是指開明專制的政體，而非極權制度。此外，三位前後學者對於俄國歷史上的短暫民主實驗，也有不同的意見。卡拉姆金以感性的筆調描寫該試驗的失敗，並歸罪於該制度不合民情需要。柯留契夫斯基與普拿托諾夫，則依據歷史事實，理性的闡明市民大會內部運作不佳、社會階級利益的衝突等，才是俄國民主實驗失敗的真正理由。

總而言之，莫斯科史學派在俄國大革命爆發前夕，已經朝理性化、物質化、機械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該學派因而為蘇聯的馬克斯史學奠定了半壁江山，無怪乎日後馬克斯教條史學能迅速的在俄國境內立足。事實上，蘇聯早期的著名史學家如波克羅夫斯基等，亦多出於莫斯科史學派門之下。不過，他們也為莫斯科史學派敲響了喪鐘。

最後，在對莫斯科史學派的小評方面，由於他們過分著重內部的社會、經濟發展，乃至專制王權的演變，以致忽略了俄國境內其他民族的發展。他們也漠視了俄國史上的民族問題、外交問題；唯有在與內政攸關時，該派學者方會提及相關的外交問題。因此嚴格來說，莫斯科史學派的歷史係大俄羅斯族史，或是莫斯科政權發展史。